

姚孝遂/主编

中国 文字学



史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字学史

吉林教育
出版社

姚孝遂\主编

刘钊·董莲池·王蕴智·李玉洁\著



(吉)新登字02号

中国文字学史

姚孝遂 主编

责任编辑：于靖权 李静

封面设计：曲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25印张 2插页 451000字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定价：15.00元

印刷：通辽教育印刷厂

ISBN 7-5383-2631-6/I.57

《中国文字学史》序

姚孝遂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赖以依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自从有了语言文字，人们才有可能交流和积累生产和生活经验，持续不断地世代发展进步。尤其是文字，更是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人类的聪明才智积累起来，使之充分得到发挥。没有语言文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人类社会文明，而永远停留在其原始状态，无法前进一步。

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都有其不同的语言文字。而人类早期的语言发生和发展过程，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只能通过记录这些语言的文字，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而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文字，沿袭了数千年之久，虽然其形体累经发展变化，然而其基本体系始终得以维系，未曾动摇。因此作为研究中国文字的专门学科中国文字学，对于探讨人类社会文明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任何一种文字，都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字只有发展到有固定的形体，有固定的读音，能够与语言完全同步的阶段，才能胜任记录语言的职责，才是成熟的文字，我称之为严格意义的文字。

早期的刻划符号和图形表意符号，不能与语言同步，无法完全胜任记录语言的职责，这种既无固定形体，又无固定读音的文字，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它属于文字的早期不成熟状态，我们不妨仍然称之为文字，但不属于严格意义文字的范畴。

严格意义的文字，必须是与语言完全同步，也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地记录语言，任何表意性质的文字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文字自商代晚期的小屯文化的甲骨文字始进入成熟阶段，距今已有四千余年了。然而甲骨文字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间突然产生的，它自然有一个逐渐孕育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的图形符号以及早期商代陶文中窥见其来源。然而商代甲骨文的孕育期最少也在两千年左右，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文字自其成熟阶段开始，历经商代的甲骨文字，两周的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的简牍、玺印、货币、缙书，由篆而隶，由隶而楷，直至今日的简化汉字，都是一脉相承的，有其因袭继承关系，其递嬗之迹是可以寻绎的。这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进化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研讨，探索文字形体演变的现象及其规律，就是中国文字学的首要任务。当然与此同时，还要探索文字形、音、义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从理论上来说，自从有了文字，就必然会存在着对文字进行研究的问题。在文字产生的早期，文字为少数人所掌握和利用，在商周时代，通晓和利用文字的主要是史官，及至春秋战国以后，文字逐渐普及到较为广大的阶层，突破了少数人垄断的局面，这就是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得以空前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也就促进了文字本身的急剧发展和变化。

在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而不同时期的文献，其文字形体都存在差异，一般人只能辨

识通行的文字形体，而不能释读早期的文献。在春秋时期，只有极少数具有特殊学识的人才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历史文献。战国的古文书籍，在西汉时期也只有少数学者能加以通读。孔安国、司马相如、扬雄都以能释读古文奇字而闻名。甚至班固撰写的《汉书》，在东汉时期一般人也不能加以释读。这正如同今天的年轻人不能阅读繁体字书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文字学之所以兴起的背景条件。早期的对文字不同形体的研究和探索，尚不足以形成系统的文字学理论。这是由于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规律性认识，都需要经过漫长的积累和深化过程。中国文字学究竟什么时候形成完整的体系，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我个人认为许多学者根据郑众注释，以为《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六艺”之一有“六书”，这个“六书”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和许慎《说文解字》所称的“六书”，是一个完整的文字学理论体系。这种见解是难以成立的。

郑众对《周礼·保氏》“六书”的解释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辩论《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无论是西周还是战国，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已形成了文字学理论体系，既无任何有关的言论，更无任何有关的著作。所谓《苍颉篇》、《史籀篇》等等，只不过是识字课本之类的性质。西汉时期的《急就篇》也是如此。战国时期及其以前，没有任何的大规模整理和研究文字资料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形成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周礼》“六艺”中的“六书”，应指书体而言，与文字学理论的“六书”不相干涉。

西汉时期，废秦禁书之令，民间藏书大量出现。尤其是孔子壁中书的被发现，为研究战国文字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这些书籍都是用战国古文书写的，当时一般人不能认识，这些书籍的释读只能依赖少数的专门学者。西汉时期，当政者崇尚学术，

经学大兴。政府立有专门学官，对历史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而且经常举行规模庞大的讲学学术活动，参加者都是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对古文的研究是其主要内容之一。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整个东汉时期而不衰。西汉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加上当局的重视，尤其是大批新资料的发现，学术空气的空前活跃，相互学术交流的频繁，都为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必要的、而且是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认为，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在西汉武帝时期以后。

遗憾的是，我们迄今尚未见到西汉时期有关文字学理论的专门论述，只是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简略地提到了“六书”的具体名目。其内容与许慎《说文解字》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肯定在班固以前，中国文字学的理论体系就已经确立了。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有关文字学理论具体而详细阐述的专门著作，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1800多年以来，《说文解字》一书在中国文字学史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被尊崇为文字学的经典著作，有着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谁要是背离了许慎的学说，就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攻讦和排斥。许慎的学说，为中国文字学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他的继承和崇拜者，却凭借和利用许慎的权威，阻碍了中国文字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必须有赖于新资料的补充，新领域的开拓，新手段的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充实、完善其理论体系。任何形式的固步自封，不敢超越传统的束缚，不敢超越权威雷池一步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

许慎《说文解字》所致力追求的是文字的本形本义。然而他所根据的只限于战国古籀和秦汉小篆，而古文、籀文、小篆都是累经讹变的文字形体，这对于追求本形本义而言，就难免存在很

大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六书”理论体系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性。

中国文字形体的来源，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许慎的这一说法是十分正确的。然而中国文字形体自甲骨文开始，即已逐步进行符号化的改造，由篆而隶，是一个突变，已无从看出其“画成其物”的原貌了。宋代郑樵的《六书略》在文字形体结构的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他是基于隶变后的文字形体，突破了传统的部首偏旁的概念，而以最基本的“点”“横”“撇”“捺”作为形体的组成部分，并提出了“子母相生”的孳乳分化理论，其见解无疑是十分卓越的。非常可惜的是，他没有来得及全面而系统地进一步发挥他的独到见解，因而他在文字学上的卓越成就也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文字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是随着文字形体的不断发展变化而进一步前进发展的。然而翻开中国的文字学史，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中国的文字学长期停留在篆文（包括古文、籀文和小篆）形体的研究上面，而且长期受到“六书”理论的束缚。文字本形本义的追求几乎成了唯一的重点。

唐宋以后，由于金石学的兴起，新的文字资料出现，人们开始对传统观念有所怀疑。唐代的李阳冰首先对《说文解字》中对于某些文字形体的误解提出了异议。然而很快就遭到了非难。南唐时徐锴著有《祛妄篇》，对李阳冰的见解逐条加以批驳。李阳冰的有关著作我们现在已无从得见了。然而幸运的是，他的见解大量保存在《祛妄篇》中，使我们得以窥见其大概。以现代的认识标准来衡量，李阳冰的说法有一些确实是错误的。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是十分中肯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元代戴侗的《六书故》根据周代的青铜器铭文资料，对传统的有关文字形体的说解提出了异议，多所是正，见解独到，将文

字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继之而作的有周伯琦的《六书正讹》和《说文字源》，在突破传统说解方面也是有贡献的。

任何与传统相抵触的新事物，新观点，都难免遭到非难和攻讦的厄运。这是由于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不成熟和不完善的成分。而人们对于新生事物也需要有一个认同和接受的过程。我们所要提防的是种种顽固不化的偏见。

丁福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应该承认，在学术上是有所贡献的。他在《说文解字》的研究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然而他对于戴侗、杨慎、周伯琦等人的著作，目为异端，擷而不录，则不能不是一种偏见。

清代小学复兴，《说文》之学盛极一时，大家辈出。然而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乾嘉诸大师如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段玉裁等，都具有超人的学识和智慧，而对于新出现的大量古文字资料不屑一顾。钱大昕直截了当地怀疑这些文字资料的真实性。不相信新事物，就难以摆脱旧有的桎梏，从而也就使发展和成就受到了局限。即使是圣贤也不能例外。

有清一代在文字学理论方面能有所突破，有所贡献的只有王筠。他一改乾嘉以来只注重单文孤字形音义说解的传统，深入地探讨了整个文字形体结构的体系问题。《说文释例》一书，是一部精心之作，富有独到而新颖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新出现的文字资料，大胆加以运用，首先是在传统的说解文字形体方面提出了质疑，进而触及到整个文字形体结构的体例问题，终于跨越了传统理论的窠臼，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其以后的吴大澂、孙诒让等，虽然掌握和运用较王筠多得多的新资料，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对于文字理论体系的发展，却毫无建树。

19世纪末叶，殷墟甲骨文的被发现，给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在其初期，学者们集中精力考文释字，

直至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始在辨识文字形体的基础上进而探讨文字形体结构的规律性问题。数十年来硕果累累，本书已详加论述，无庸赘言。

文字发展到隶楷阶段，今天又经过简化的改造，已属于纯符号的性质，显然已经不能以“六书”的理论加以范围。谈到汉字的简化，目前仍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简化破坏了汉字的传统形体结构，失去其表义的特征。这既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偏见。

自甲骨文开始，汉字就不断处于简化的过程之中。甲骨文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简化形体。到了战国时期，更是对文字形体进行了全面的简化。简化过程，是文字形体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并不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甲骨文开始，汉字就已经不是以形见义的文字，所谓表意文字是不能胜任记录语言的任务的。

有人举出现代的“哭”字，使人一见就有哭的感觉；“笑”字使人一见就有笑的感觉。又有人举出“汹涌澎湃”这些字的本身，就会给人以波澜壮阔的感觉。实际上文字形体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功能和作用，这不过是人们心理上产生的联想，是一种条件反射作用。

文字形体的发展演变，以及大量文字资料的出土，都给文字学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并促进文字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文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既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对文字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借以指导文字今后发展的趋向。这就是为什么要加强文字学和文字学史研究的目的所在。

本书的著作者有以下各位，其具体分工是：

第一章刘钊 第二章李玉涪 第三章王蕴智 第四章、第五

章、第六章董莲池 第七章刘钊 第八章8·0、8·1刘钊 第八章
8·2王蕴智 第八章8·3以下董莲池 第九章王蕴智

1993年孟夏序于长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文字学的滥觞期——先秦时期的文字学

- 2.0 引言 5
- 2.1 对汉字来源的推测 6
 - 2.1.1 来源于结绳说 7
 - 2.1.2 来源于契刻说 9
 - 2.1.3 来源于八卦说 10
 - 2.1.4 仓颉造字说 12
- 2.2 对文字形体的朦胧认识 17
- 2.3 对文字构形的原始划分 19
- 2.4 对文字形体的第一次整理 22
- 2.5 童蒙字书的编纂 26
 - 2.5.1 《史籀篇》 26
 - 2.5.2 《苍颉篇》等 30

第三章 文字学的开创期——汉代的文字学 35

- 3.0 引 言 35
- 3.1 汉代的经学和小学 36
 - 3.1.1 汉代经学的兴盛 37
 - 3.1.2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 40

3.1.3 汉代小学字书说略(一)·····	45
3.1.4 汉代小学字书说略(二)·····	50
3.2 许慎的生平事迹与撰著·····	57
3.2.1 许慎的身世与经历·····	58
3.2.2 许慎的学术撰著·····	64
3.3 许慎系统的文字学思想·····	70
3.3.1 朴素的文字演化观念·····	70
3.3.2 汉字六书理论的确立·····	74
3.4 文字学的奠基著作——《说文解字》·····	82
3.4.1 《说文解字》的内容取材·····	82
3.4.2. 《说文解字》的编排体例·····	90
3.4.3. 《说文解字》的解说体例·····	98
3.4.4. 《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及其局限·····	112
第四章 文字学的发展期——魏晋至唐代的文字学 ·····	126
4.0 引言·····	126
4.1 新字书的编纂·····	127
4.1.1 《三仓》类字书·····	127
(一) 专收传抄古文类字书·····	127
(二) 专收要用字、俗字、错误字、常用字类字书·····	129
(三) 专门标注字音类字书·····	129
(四) 童蒙类字书·····	129
4.1.2 《说文》类字书·····	130
(一) 吕忱和他的《字林》·····	130
(二) 江式和他的《古今文字》·····	132
(三) 阳承庆和他的《字统》·····	134
(四) 顾野王和他的《玉篇》·····	135
4.1.3 专为正字而编的字书·····	142

(一) 颜元孙和他的《干禄字书》	144
(二) 张参和他的《五经文字》	147
(三) 唐玄度和他的《新加九经字样》	150
4.2 校理、注释《说文》	151
4.2.1 李阳冰刊定《说文》	151
4.2.2 徐锴对《说文》的校注	154
第五章 文字学的拓展期——宋至明的文字学	164
5.0 引言	164
5.1 宋代国家主持的对《说文》《玉篇》的校订	165
5.1.1 徐铉等奉敕校理《说文》	165
5.1.2 陈彭年等奉敕对《玉篇》的修订	168
5.2 “说文学”的兴起	173
5.2.1 李焘改编《说文》	173
5.2.2 郑樵、戴侗等对《说文》的研究	174
5.3 字原学的形成	178
5.3.1 郑樵的字原研究	179
5.3.2 戴侗的字原研究	181
5.4 六书理论的研究	181
5.4.1 郑樵的六书研究	181
5.4.2 戴侗、张有的六书研究	183
5.5 “右文说”的创立及学术价值	185
5.6 金石学的兴起	188
5.6.1 金石学的起因	188
5.6.2 宋至明对金文的整理与研究	191
(一) 撰成目录提要	191
1. 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191
2. 赵明成的《金石录》	193

(二) 尝试对铜器断代	194
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	194
(三) 图录器形, 附摹铭文	195
1. 吕大临的《考古图》	195
2. 宋徽宗敕撰的《博古图录》	196
(四) 考释铭文	198
1. 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198
2. 王楙的《啸堂集古录》	202
3. 王厚之的《钟鼎款识》	203
(五) 编纂金文字典	204
《考古图释文》	204
5.6.3 宋代在铭文考释方法上的创获	206
5.6.4 宋至明对石刻文字的整理与研究	208
(一) 考释文字	208
(二) 编纂汉隶字书	211
5.7 宋代对传钞古文的整理与研究	212
5.7.1 宋以前古文的流传	213
5.7.2 郭忠恕的《汗简》	214
5.7.3 夏竦的《古文四声韵》	221
5.8 宋至明楷书字典的编纂	224
(一) 《类篇》	224
(二) 《龙龕手鑑》	228
(三) 《字汇》	231
(四) 《正字通》	236
5.9 正字字书的再编撰	241
(一) 《佩觿》	241
(二) 《复古编》	247

(三)《字通》《字鉴》	249
(四)《俗书刊误》	253
5.10 汉字构形研究中的逆流代表作——《字说》 的产生	254
第六章 文字学的兴盛期——清代的文字学	263
6.0 引言	263
6.1 清代对《说文》的研究	264
6.1.1 “四大家”的《说文》研究	266
(一)段玉裁的《说文》研究	266
(二)桂馥的《说文》研究	287
(三)朱骏声的《说文》研究	291
(四)王筠的《说文》研究	299
1.《说文释例》的创获	299
2.关于《说文解字句读》	305
6.1.2 四大家之外的《说文》研究	307
6.2 文字学理论的研究	310
6.2.1 戴震对六书理论的研究	310
(一)创为“四体二用”说	311
(二)对“转注”提出了新的看法	313
6.2.2 朱骏声、江声、章太炎等对“转注”的研究	313
(一)朱骏声创为“词义引申说”	313
(二)江声创为“立部属字说”	314
(三)章太炎创为“音转说”	314
6.2.3 对文字符号的性质的认识	314
6.3 对金石铭刻的研究	316
6.3.1 对铜器铭文的搜集整理	316
6.3.2 对铜器铭文的考释	321

6.4 《康熙字典》及其它字书	330
第七章 文字学的全面发展期	
——近现代以来的文字学研究(上)	336
7.0 引言	336
7.1 甲骨文研究	338
7.1.1 甲骨文的发现与著录	338
7.1.2 甲骨文字考释	342
7.1.3 甲骨文工具书的编纂	351
7.2 金文研究	361
7.2.1 对金文资料的整理和著录	361
7.2.2 对金文文字的考释	365
7.2.3 金文工具书的编纂	377
7.3 战国文字研究	396
7.3.1 战国金文研究	396
7.3.2 战国玺印文字研究	401
7.3.3 战国货币文字研究	416
7.3.4 战国帛书文字研究	431
7.3.5 战国简牍文字研究	439
7.3.6 战国陶文研究	443
7.3.7 战国玉石文字研究	450
7.3.8 战国文字构形研究	458
7.4 关于古文字考释方法的研究	468
第八章 文字学的全面发展期	
——近现代以来的文字学研究(中)	475
8.0 引言	475
8.1 对《说文》的研究	476
8.1.1 研究《说文》的著述	476